

访谈

黎安友 / 王天成

中国民主季刊

第 1 卷 第 4 期
2023 年 10 月
CC-BY-NC-ND

自由、免费转载分发，但须注明
作者与出处，并不得修改及商用

发展、韧性与危机：这个政权还能持久吗？



黎安友



王天成

编按：中国的一党专制政权曾表现出很强的韧性、适应能力。习近平所建立的新极权体制，是否也同样有这种韧性和能力？它是否有能力修复最近显然陷入困境的经济？中国的发展程度是否已经使民主化变得更加可能？它是否可以不经历民主化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？美国及西方一些国家所说的“中国威胁”是什么？中国将来如果分裂，会有什么可能后果？《中国民主季刊》主编王天成就这些普遍受到关注的问题，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、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 (Andrew J. Nathan)。黎安友教授长期关注中国民主人权问题，曾帮助过许多中国学者、活动人士。今年恰逢他八十大寿，我们做这篇访谈也是本刊全体同仁对黎安友教授的祝贺、感谢和致敬。

王天成(以下简称王)：黎安友教授，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。您长期关注中国的问题，有独到的分析和见解。中国很多学者和读者对您的观点非常感兴趣、非常关注，很高兴今天能对您做一个访谈。做这个访谈，还有一个特殊原因，就是今年是您80大寿。过去几十年中您帮助了很多的中国民主人

权人士，我和同事们都觉得应该为您庆祝、向您表示感谢。

黎安友(以下简称黎)：到了八十了，还得学习（笑）。

王：中国的事情在不断变化，所以要不断密切关注（笑）。我们从您在2003年左右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开始，就是中国威权主义具有韧性（authoritarian resilience），适应能力很强。您不同意当时有名的一个看法，即“中国即将崩溃”，也不同意一些人对民主化的乐观预期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看来您是对的。不过，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。当时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两位数增长率。同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继承趋于制度化。现在经济增长显著放缓，前景堪忧。习近平向毛时代的极权主义倒退，当然不能完全回到毛时代；也废除了任期限制、终止了制度化。还有，中国的国际处境也显著恶化。您认为习近平的新极权统治是否也具有韧性？

黎：这个问题当然提得非常好。中国现在面临一些经济问题，但这不是第一次。过去也面临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经济问题，他们过了关，因为他们管理经济的一些专家非常有能力。这一次是不是比过去更严重一些，值得讨论。因为现在经济的危机可能有三、四种特殊情况。

一个是地方政府债务，现在的规模比以前更大，有没有办法解决是一个问题。第二，外部市场与过去比不那么欢迎中国的产品，这个跟地缘政治因素有关，就是中美之间的所谓“战略竞争”，以及中国“战狼外交”引起一些欧洲国家、澳大利亚的反对情绪，认为与中国经济联系过于密切是一个安全威胁。所以，外部出口市场能不能恢复是一个问题。第三，人口结构问题，人口越来越老化，长期看会给中国经济更重的负担。最后，可能

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气候暖化。

考虑到这几个比过去更严重的问题，中国能不能恢复经济发展速度，值得怀疑。这是第一个层面。

第二个层面，政治方面的问题，您刚才提出了习近平上台以来的去制度化。其中，关键是接班。除此以外，应该承认中国现在还是非常制度化的。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，有一个庞大执政党和党内纪律体制，有一系列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。所以，从制度化看，关键是接班有没有制度化。

我认为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的制度，动摇了接班的稳定性。因为如果习或者身体不佳，或者突然去世，或者习的政权受到党内外的挑战，遇到这么一个政治危机的时候，在人大或下一届人大、或者党内有人提出接班问题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人及时接班？等等。

当然，按法律、按党章有一个接班程序。比方说，国家主席是副主席接班，但是副主席是不是真的能够接班、巩固权力？所以，如果习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不能继续掌握权力，可能会引起比较激烈的权力斗争，这非常危险。

总结起来，关于中共的制度是不是还有韧性的，我认为近期、中期仍然有韧性，因为国家力量强，社会力量弱。但习如果出问题，韧性的期限很可能结束。

王：可不可以这样概括您刚才说的，就是习近平废除任期限制，把权力集中

在他个人的手里，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体制的不稳定因素，但是，这个体制同时还因为官僚体系很强、社会弱小而从中获益。可以这样概括吗？

黎：可以。

王：我们回到经济的观察角度，回到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理论。现代化理论学者，例如李普塞特（Martin Seymour Lipset），认为民主的产生与存在跟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高度相关。过去也有经验研究，比如说已故哈佛教授亨廷顿（Samuel Huntington），他的研究认为民主转型更有可能发生在中等发展程度国家。中国10多年前就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，如果亨廷顿的看法成立的话，它现在实际上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可能民主化。我们国内国外有很多学者、评论家认为现代化理论不适用于中国。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？现代化理论是不是一个适合分析判断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工具？

黎：现在的中国比过去当然现代化多了。人均收入13,000到14,000美元。中国的中产阶级多大要取决于定义。中国全部人口的1/3左右是中产阶级，他们住在大城市，教育程度高，有房子、车子等，能够到国外旅游，享受消费主义生活。当然，中国还有2/3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，属于工人、农民、少数民族等等。

但这个2/3的、比较不富裕的人口，他们中90%左右受过教育，用互联网、手机、计算机、电视，信息来源丰富。当然信息都是当局产生的。但他们有这种信息工具，所以包括农民工人，他们的期望也提高了，对生活的要求提高了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可以期望中国会民主化。但是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等人的观点不完全一致。李普塞特是1950年代写作的，而且他的理论不涉及到民主转型，而涉及到民主稳定。他说如果是生活水平比较高，中产阶级占多数，一个已经有民主制度的国家，应该会维持民主制度而不倒退。

亨廷顿提出另外一个观点，认为民主转型、民主的存在、民主的韧性等主要不取决于经济格局，而取决于政治制度本身。政治制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，如果政治制度比较强、比较制度化，你的制度无论它是民主还是专制的，都会有效。

那么，后来有一些学者，比如普热沃斯基（Adam Przeworski），认为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有民主转型，主要取决于一些偶然的政治因素，跟经济发展程度缺乏必然关系。但转型之后，如果超过平均6000美元人均收入——当时是6000美元，现在可能要更多，因为每年货币在贬值——它就不会倒退回专制。

现代化理论对于中国民主化的判断比较复杂。我认为中国情况是特殊的。它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（最近被印度超越），历史复杂，社会结构复杂，外部环境复杂。不能用简单的学术理论去概括中国的未来。

王：中国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，而且应该区分民主与存在的条件。我们接着往下走。过去有不少的威权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，比如智利、韩国等，但是后来经济放缓，它们就陷入危机、发生了转型。斯坦福大学的戴雅门（Larry Diamond）教授认为现代威权国家有一个“经典悖论”（classical contradiction），一方面需要做到经济快速发展、提升生

活水准来维持统治，但是经济发展本身也会预备有一天可能摧毁专制的力量，包括刚才谈到的中产阶级和独立的公民社会；当经济放缓、不能满足人们对生活的期望，危机可能就来了。我认为，从大的方面看，中国其实也在经历这样的悖论，虽然对中产阶级、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有不同看法。您是否认为中国也陷在这样一个悖论中？您如何评估经济放缓对共产党政权构成的政治挑战？

黎：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这样描述，就是它如果能够达到快速发展的目标，长期看会威胁它的政权，因为越是快发展，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知识程度、资产的拥有量、对生活的要求、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等等就越高，就越快培养一些早晚会反对专制统治的力量。

但同时，如果不快速发展的话，会引起大家的不满情绪。举个例子，现在我们听说中国的年轻人，就是16、17岁到20多岁的人，失业率超过20%，不能就业的人会不满意，很多人要到国外读书或者读第二个学位等找出路。年轻人不满意对任何一个政权都是非常危险的。在过去中国的一些历史中，学生是最危险的，对不对？

王：我做学生的时候开始参加“造反”（笑）。

黎：对。五四运动、1989年都是学生造反。所以，我认为经济发展快的话长期看会有危险，经济发展慢的话会有近期的危险。但同时，也要承认上面提到的、中国的威权制度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威权制度更强大。它有更多的工具去控制，比方说人工智能。如果年轻人要造反，他一上街，警察立刻就知道谁上了街，谁说了啥，等等。所以，你要反对这个政权，比以前

反对任何一个中国的政权，或者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权，或者任何一个不知道哪里的纳粹政权，都要危险。而且，我认为中国人都是非常清楚这点，所以他们不可能任意地去“妄议中央”、任意去上街，需要别的历史事件、更严重的危机，才能让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一般人上街。

所以，我一方面承认经济问题给了现在的政权一个矛盾，承认发展快速有危险、慢速也有危险，但同时不能简单说因为经济的问题，中国的政权早晚会的倒台，我没有信心那么简单地判断未来。

王：现在经济放缓显著，的确遇到了麻烦。新冠疫情之后，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有大的反弹，焦虑、失望的情绪非常普遍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尽管经济很糟糕，共产党可以用更残酷、严厉的手段控制，可以变成北朝鲜那样，经济不发展、贫穷也没关系。我觉得北朝鲜和中国不太一样，北朝鲜的人没有享受过经济高速发展的好处，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经济发展中间期望值提高了。假如对现在出现的经济问题，共产党不能像以前一样修复，您觉得中国变成北韩的可能性有多大？

黎：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个可能性，第一，你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已经富裕了很多，它不可能倒退到北韩的地步。第二，北朝鲜非常孤立、跟外部没有什么来往，中国已经打开了大门，没有彻底关门的可能。第三，我要承认北朝鲜是一个谜，我明白北朝鲜怎么能够这样。是不是跟朝鲜人的文化有关系，跟朝鲜与韩国是分离的紧张格局有关？我认为很难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北朝鲜怎么能够维持这么一个制度。但是，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这么做，因为中国老百姓太聪明，他们的自尊不会接受这种待遇。

王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先例，就是一个国家到了中等发达程度后，它不经过民主化就上升为发达国家——当然，这里我们不考虑一些石油出产国。若干年前，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欣教授，在我作为《中国战略分析》共同主编时对他做的一个访谈中，特意提到这一点。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，您认为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例外，不经历民主化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？

黎：从某种角度去看，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。从技术发展、工业化程度看，它已经是一个高技术化、高教育化、高交通化、非常发达的国家。有些中国人来到纽约，认为纽约是一个不发达地区，比北京、上海落后。

王：他们说纽约像第三世界（笑）。

黎：我们看起来像落后国家，中国是发达的（笑）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敏欣教授的观点已经被否定（笑）。中国提出了一种另类现代性观点。传统上我们认为现代化的模式只有一种，就是资本主义、自由主义民主等等。所以，现代性（modernity）只有一种。但是中国和南半球、西方之外的一些理论家认为，也可以有另一种或另几种现代性。中国是另一种现代性，就是说它同时有一个全球化的经济、消费主义的社会，但是政府控制着制度和文化的建设等等，跟西方不一样。

我认为中国可以说自己是另一种现代性，但是它的现代性不是非常稳定，因为它里面有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内在矛盾，包括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接班制度。

当然，同时也要承认西方的现代性也不一定非常稳定。从历史的角度看，美国的制度会不会永远存在，欧洲的制度会不会永远存在，都是动态的局面，都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。历史是不停止的。

有个理论家过去说历史终结了，是吧？（王：福山《历史的终结》）。可是我们发现历史没有什么终结，除非打核战终结或者气候暖化终结人类历史。终结人类才能终结历史，有人类就不会终结历史。

我们有点偏题了（笑）。的确要承认西方也有它的问题，但是中国的另类现代性特别不稳定。我不是说它5年或者10年之内或者多少年之内发生危机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它早晚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。——中国到根本变化的时候，是会转好还是转坏，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

王：我觉得什么算发达国家，应该有一个指标，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人均收入。中国虽然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，但人口很多，平均收入还是不高的。

黎：中国的人均收入13,000-14,000，当然没有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欧洲那么高，但是还是不错（笑）。

王：还有东欧国家，比如波兰、捷克等等，人均收入也要比中国高不少（笑），属于发达国家行列。我们现在转到另一个问题，看看最近中国的国际环境。美国和西方盟国已经形成了共识，大家要共同应对“中国威胁”，最新的说法叫做“去风险化”。与以前不一样，对华政策转向强硬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，是限制关键技术出口和进入中国，包括半导体芯

片、人工智能等。

您前不久提到西方对华政策这种转变会刺激老百姓的民族情绪，老百姓会更加支持政府，这一点上可能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。作为一个美国教授，您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，西方所感到或者受到的“中国威胁”是什么？威胁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？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对它的崛起，西方会不会不那么担忧、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态度？

黎：西方是一个概念，美国是一个概念。为了简化我的回答，我主要注意中国对美国的威胁。可不可以这样限制一下？

王：请限制在美国。

黎：美国是西方的一部分。所谓的“中国威胁”，对于美国具体是哪些，在美国是很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。我们都能够同意，比方说中国要统一台湾会威胁美国的一些利益、在亚洲的影响。也可以承认，如果中国占领所谓的“21世纪经济高峰”，比如半导体技术、电力车生产、新能源技术、人工智能等等——换句话说，谁能够占领控制这几个21世纪经济非常关键的领域，谁就会占优势、赚很多钱，会或多或少控制别的国家的经济和信息，更方便进行信息战、间谍活动。

所以，台湾是其中一个问题，第二个是21世纪经济的垄断或者控制、优势，谁胜谁败至关重要。

其次，还有很多别的、不一定那么清楚的方面，比方说中国要不要推广它

的意识形态到别的国家，要不要动摇西方人权民主意识形态的权威？它要不要在非洲或者南美或者中东，取代美国和西方的影响？它要不要取代西方控制国际组织，比如联合国、世界银行、世贸组织？要不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新国际秩序？这些都成问题。

西方学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共识。我自己的观点是，我们为什么搞不清楚中国的威胁的一个理由，是习近平说话不是非常清楚，他没有很清楚说他的“中国梦”在国际领域具体是什么。他当然在台湾问题上、在中国的技术发展上、很清楚，但是别的问题他用比较朦胧的提法，比方说“国际秩序民主化”、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。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很难说（笑）。

所以，这个问题不能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。但是，我认为如果我们看最基本的层面，就是中国威胁台湾、威胁西方在技术领域的优势，这两点已经足够告诉我们与中国的、拜登政府所谓的“战略性的竞争”（strategic competition）是什么。这个战略性竞争已经够严重、够庞大、够重要。所以，我认为西方的决策者可以基于这两个威胁制定、推展政策。

台湾问题不只是台湾的，也对西方同盟体系稳定性构成挑战。如果中国可以用武力统一台湾，美国和日本、澳大利亚、北约、欧盟的同盟关系都会被动摇，因为美国会失去所有的可信度。所以，我认为台湾问题不只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，它是一个很大的、全球性的问题。

还要说一句，我认为武力攻台是一个“零和游戏”。为什么是零和游戏？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以提高互相信任，可以找一个办法谈判。我并不认为，中国应该把情绪的因素、心理的因素和百年侮辱的因素放在一

边。中国为了它自己的安全，需要控制台湾这个大岛。但美国因为台湾问题跟盟国体系的关系，它必须不能让中国用武力统一。我们可以拖，把这个问题拖到未来，但不能找到一个两边都高兴的解决方式，是不是？

王：台湾当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，不能接受以武力解决，也不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吞噬一个民主政治体。我的另一个问题是，假如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对于它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的崛起，它对周边和更远方影响、控制潜力的增强，美国、西方的态度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？我今天问了很多假设性问题（笑）。

黎：好的（笑）。我刚才提到，中国作为一个地理存在，一个庞大的地理存在，它在海边有所谓的“第一岛链”，日本岛、台湾岛、菲律宾岛、印尼岛，到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等。海军如果要自由地穿行大海，它要通过第一岛链。如果台湾不是中国控制的，你不能穿越第一岛链自由地去大海。

中国为什么要去大海？因为中国是一个贸易国家，进口庞大、出口庞大，进口包括一些非常关键的、经济需要的资源，比方石油。所以，我认为，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，或者是王天成还是黎安友控制的政府（笑），都要突破第一岛链。要突破一岛链，只有一个方法，那就是控制台湾。所以，这个问题不是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，而取决于一些客观的、安全上的考虑。

王：我们在国内和海外流亡人士中，当然其中包括学者、自由知识分子，有相当一部分认为中国的统一是不重要的，可以、甚至应该分裂成很多小

国。当然，也有很多的中国人很担心、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。我从民主转型的角度，觉得中国在政治控制放松后如果分裂，会让民主转型复杂化，可能会导致民主转型失败。所以，我认为应该研究采用什么转型战略，才更可能避免分裂、成功建立民主。在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，第一本著作是关于民国初年北京政治的。从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，以及从国际政治的角度，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假如说中国分裂，它可能会有什么后果？

黎：中国以前有分裂的格局，20世纪相当长时间是军阀时代。我认为，军阀时代的分裂是不能持续的。因为有两种因素发生影响，而现在这两种因素比二十世纪初更强。一个是刚才也提到的，作为一个地理存在，中国必须统一，如果不统一的话，它的经济不灵，交通受到阻碍，安全也非常脆弱，等等。就是说，客观来讲，它必须统一，自然而然是一个统一的存在，而不是一个分裂的东西。它一分就要合，就会有一种内在动力要统一。

第二个因素是人性，人性本恶，对不对（笑）？比方说，你是广东的统治者，你当然要控制福建、广西、云南，你认为自己不安全，因为你怕福建的统治者会攻击你，所以你要先攻击他，等等。所以，如果再有一个军阀分裂的时期，军阀和军人当然还要打仗。

所以，我认为不仅从地理上的客观、自然而然的性质来讲，从人性的观点来讲，如果中国分裂，为了不让分裂的状态继续，就一定要经过一个统一的过程。

从外部的观点来看，分裂的中国并不是好事，因为第一，它不稳定，第

二，它不富裕。从外国的角度看，现在的中国虽然有一个所谓“中国威胁”，它也有一些好处，比如我们知道是谁执政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知道要给习近平打电话，他有权力解决。如果他愿意的话，他有权力回答你。如果中国是分裂的，它还是一个人口非常多、经济很重要的国家；在各种国际问题上，像气候暖化、国际组织问题，等等，它还是一个关键的国家。如果它分裂了，我们不知道谁能够接电话。所以，我是认为西方不太想看到中国分裂。

王：非常感谢您的这些细致的评论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刚开始时说过，今天做这个访谈，除了中国很多学者、活动分子对您的看法非常感兴趣，还有就是今年是您的80大寿，按中国传统应该特别庆祝。您过去帮助了很多中国民主活动人士，包括我本人也是您帮助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。借这个机会，可否请您对您曾经帮助过的人说几句话，包括您的期待？

黎：我自己不相信这么快就到了八十岁，我内心的感觉还没有到八十。

王：十八岁（笑）。

黎：十八岁或者六十（笑）。我要从两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。第一，你们在中国之外关注中国，因为你们是中国人的，当然关注自己的国家，它有自己的文明、自己的文化。你们在国外有一个特殊的责任，就是利用国外的言论自由的环境追求真实。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个方面的机会非常受限制，他们可以思考，但是不能自由出版、发言、广泛交流。所以，你们这个责任非常之重，我非常佩服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在国外继续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工作。

第二点，你们住在自己国家之外，有一个生活的问题，要有收入、要解决语言的问题、要解决家属的问题，要适应一个对你们奇怪的文化环境，等等。所以，我如果在过去帮助过一些人的话，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光光是抽象的知识分子、抽象的战斗者，他们也是人、有人的现实问题。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小小的帮助，帮他们安定下来、稳定生活，他们才能够继续思考、继续发言、继续奋斗。这大概就是我要说的。

王：再次感谢您。请多保重。